

國際商會百年峰會致辭

馮國經 博士

2019年5月29日

邁向可持續並具包容性貿易的新世紀：對和平商人的號召

開場白

非常感謝 Paul 的溢美之詞。各位先生、女士、朋友，我非常高興能同在座各位一道參加國際商會 (ICC) 的百年紀念慶典。追憶當年擔任主席時的愉快經歷，我非常榮幸能與這個組織結下不解之緣。

自成立以來，ICC 就一直不懈地為國際貿易和開放性的世界經濟而努力，以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基於這個初衷，ICC 不斷的適應、發展，並且日益壯大。我們特別幸運，能由 Paul Polman 先生以及 John Denton 先生一同領導 ICC 渡過這段變革的時期。

世界正在以史無前例的速度進入數碼化時代，周圍所有事物都在數碼化，而這個趨勢只會越來越快。因此，我個人完全認同 ICC 在內部轉型的過程中以數碼化為第一要務。

在這個數碼革命的大環境下，對於那些在全球性變化中出現的新形勢，以及目前緊張的貿易局勢所可能導致的經濟影響，我想分享一些看法。我們可以將這些新發展當作是嚴峻的挑戰，或是百年不遇的大機遇。我比較樂觀，我既看到了挑戰，也看到了機遇。

國際新形勢

回望 100 年前 ICC 成立之時，世界經濟的中心仍然是英國和歐洲大陸，雖然已開始向美國轉移。當時，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大多落後貧窮，對全球經濟無關痛癢。今天不再如此。

國際顧問公司麥肯錫製作了一張地圖，顯示從公元元年到 2025 年，世界經濟重心的變化。地圖顯示世界經濟重心從公元元年到 1000 年間一直在東方（亞洲）保持穩定，然後慢慢向西方（歐洲）轉移，直到 1950 年，轉移軌跡才開始折返東方。值得特別留意的不是它的逆轉而是它逆轉的速度。經濟重心從東方轉移到西方需時接近一千年，但重返東方卻只需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這驚人的逆轉速度使其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轉變。

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研究預測，到 2050 年，亞洲將新增 30 億人可以享有今天歐洲的生活水平，亦將佔全球產出的一半以上。事實上，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到 2020 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亞洲的經濟總量將比世界其他地區加起來更大。

顯然，亞洲將重奪其在全球經濟舞台的中心地位。亞洲的零售增長率高於世界其他地區一倍，在這帶動下，亞洲消費者正成為新的市場力量。這新興的購買力可以為世界的可持續、包容性增長提供新動力，並為整個世界創造繁榮。

這個再平衡的過程才剛剛開始。幾十年來，消費品貿易一直呈單向流動——從亞洲的工廠流向西方。現在，反向的流動已經出現。亞洲有 46 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 60%，對西方的產品、品牌和服務有很大的需求。亞洲新興消

費者的需求也不僅僅限於低端商品或服務：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西方奢侈品市場，佔全球奢侈品市場的三分之一。

科技加速了這種結構性轉變。亞洲經濟體已迅速擁抱數碼革命，正大力利用科技實現跨越式飛躍，創造繁榮。這趨勢將延續下去。

中美貿易戰

許多國家為世界經濟重心重返亞洲有所貢獻，包括早年的日本和韓國，以及現在的東盟和印度。不過，當今的主角是中國。雖然對中國重返世界舞台的憂慮可能是中美關係緊張的因素之一，但我們應該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待當前的貿易戰。

全球貿易環境正發生變化。保護主義抬頭，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傳播繁榮、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系正逐步受到侵蝕。區域性、次區域性和雙邊貿易協定激增，也對世界貿易組織 (WTO) 在多邊貿易的中心地位帶來挑戰。

中美貿易戰爆發至今已接近一年半。5 月初談判破裂後，兩國分別宣布大幅上調關稅，而美國還威脅再加關稅。美國亦已採取措施，使中國龍頭科技企業難以在美國經營。恐怕世界需要對中美緊張局勢和唇槍舌戰升溫有所準備。

雖然我絕對相信中美兩國最終會達成貿易協議，但更深層次的結構性經濟問題以及兩國就科技和國家安全的摩擦可能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損害中美關係。這就是新常態，而不幸的是，整個世界將不得不適應這個新的現實。

貿易戰的後果

貿易戰難免帶來不良後果。1930 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在該法案下，美國加徵關稅，又引來貿易夥伴加徵報復性關稅，是當時美國對外貿易減半並導致大蕭條加劇的主要因素。時移勢易，但貿易戰的後果依舊嚴重。

中美互相加徵關稅為普羅大眾帶來負擔。例如，經濟學家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博客上寫道，去年美國對中國 2,000 億美元產品徵收 10% 關稅，每年對一個美國家庭平均造成 419 美元的損失；在 25% 新稅率下，每年的損失再增加 831 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擔心，最近的關稅戰升級“可能會嚴重打擊商界和金融市場的情緒，擾亂全球供應鏈，並危及 2019 年全球增長的復蘇”。

同時，中國經濟放緩會影響所有人。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另一個風險是，就像在上世紀 30 年代，一些國家可能會重推保護主義，建立貿易壁壘來保護本地企業和市場。

圍繞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的不明朗因素已經影響到全球貿易格局。由於勞工成本上升以及中國推動工業升級，在過去十年，低增值供應鏈已經逐步撤出中國。在貿易戰下，全球企業正致力實現供應鏈多元化，或者至少將部分生產轉移到中國之外。但是，要找到其他國家替代中國並不容易。

我們的家族企業置身於這些變化的中心。我的祖父於 1906 年在廣州開辦了一家出口貿易公司。根據 ICC 的說法，你可以說我是第三代“和平商人”。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業務主要是在亞洲採購並向西方賣貨。今天，我們通過加強全球供應商網絡及開發下一代數碼化全球供應鏈，來為零售商和品牌提供多樣化的採購選擇，可說是新型全球貿易商的縮影。

繼往開來

全球商業環境已從根本上改變，我們都面臨著與時俱進的挑戰。但是，我們仍可以從 ICC 創始人身上獲得一些啟發。他們的信念是，國與國之間更緊密的商業關係會降低武裝衝突的風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波之中，他們就看到了一個把這份信念付諸行動的機會。

我認同這份信念，也看到了我們現在就付諸行動的機會，為 ICC 未來的一百年奠定方向，為全球的和平繁榮作出貢獻。在此，我分享一些看法：

首先，我們要就目前的迫切需要大聲疾呼，即以重振 WTO 為基礎，重構並更新多邊貿易體系。我是以一個畢生的多邊主義者的身份說這番話。我記得，10 年前，即 2009 年，在全球金融危機泥潭之中，正是國際貿易幫助全

球經濟車輪保持運轉。如今，正正是國際貿易處於困局，這對保持實體經濟健康穩定，以及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目標來說都不是好兆頭。

其次，我們需要盡早為接下來的一百年未雨綢繆。ICC 在此次百年慶典上發佈了《ICC 未來百年全球商業聲明》，它體現了 ICC 對 21 世紀的指導原則，對此我表示由衷的贊許，並非常認同其中對於未來發展方向的規劃。

曾幾何時，一群“和平商人”，憑著共同的理想與信念，以及一戰前後制定的議程，團結在一起。他們創立了 ICC，並希望能夠通過 ICC 來實踐他們的共同的偉大目標，讓貿易驅動發展，並創造和平與繁榮。就如同任何一位好商人一樣，他們為了實現這份共同的理想，就這份議程達成共識。

這份議程基於良好的商業實踐和經驗，非常務實。他們指出了就國際商業交易的準則及標準達成共識的需要。這也為日後《國際商業術語》(Incoterms) 的最終出台，以及國際標準組織 (ISO) 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議程還將多邊方式引入到貿易談判，這也為二戰之後成立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ATT)，即日後的 WTO，打下基礎。

對我而言，這仍然是 ICC 當下的任務：即在共同的願景下，就全球商業行為議程達成一致。要重新發揮其歷史作用，ICC 目前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設計推廣一份推動 21 世紀和平與繁榮的議程。這份議程必須結合當下地緣政治和環球經濟的轉變，也需要配合當前數碼化世界的興起、環境問題，以及創新新維度的需求。新時代需要新的規則、新的實踐，以及新的機構制度，從而與時俱進，走在時代前沿。

我也相信，受全球 4,500 萬家企業支持的 ICC，歷經風風雨雨，定能夠，也必將會領導國際工商業界，在未來一百年裡，走出混亂，迎接挑戰，創造機遇，接過諸位創始人的接力棒，續寫輝煌。

各位先生、女士，歷史已成過去，未來不可限量。在這個動蕩多變的時代，我們作為全球公民，不能寄希望於依靠政府，或者多邊機構，或者某些人去塑造我們的未來。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積極參與到我們深切關心的事件中去。我們同樣必須行動起來，為所有人設計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紀。為了子孫後代，讓我們抓住當下。

####